

世界华文文学：

历史·记忆·语系

刘俊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

历史·记忆·语系

刘俊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 / 刘俊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360-8181-9

I. ①世… II. ①刘…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
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7968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技术编辑：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林露茜

书 名	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 SHIJIE HUAWEN WENXUE LISHI JIYI YUX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5 1 插页
字 数	320,000 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自序

这本集子依旧例，还是对世界华文文学发些议论。所收文章有些比较符合“学术规范”，有些则比较“随笔”一点，有的文章长些，有的就比较短，这种长短不一、形式不拘的格局，使得这本集子显得不那么“高头讲章”——虽然它有个很学术化的书名。

全书分成几个小辑：“大陆‘历史’”“港台‘记忆’”“海外‘语系’”和“白先勇与《牡丹亭》”。这几个小辑，从逻辑上讲并不一致——前三者大致与区域性的华文文学有关，最后一个是专门的作家研究。但这样编排、组合也自有我的道理，因为这几个方面既大致涵盖了我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范围，也体现了我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侧重。

我想先从“白先勇与《牡丹亭》”这个压轴的小辑说起。因为我进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是从研究白先勇开始的，从1988年算起，到现在快三十年了。至今我还庆幸我的学术生涯最初遇到的研究对象是白先勇，因为白先勇在大陆出生，少年时去了香港，几年后从香港转去台湾，大学毕业后又从台湾去了美国，在美国读书、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文学（艺术）的创作（制作）中心又回到台湾和中国大陆。世界华文文学包括的几大区域（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北美），白先勇都与之相关，而这种“相关”，又在他的文学世界里，都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这是就地域空间的跨度而言的。就文学创作涉猎的体裁范围而言，白先勇是个多面手，他的文学世界包括了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翻译、影视（电视剧和电影）等各种体裁，这使得他的文学世界是丰富的、多元的、全方位的和不拘一格的。就文学成就以及影响力而言，白先勇无疑是个文学大家，他的小说集《台北人》入选“台湾文学经典”（小说类第一名），入选“二十

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七名），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2003年，白先勇荣获台湾第七届“国家文学奖”；2004年，白先勇获得了“北京作家最喜爱的海外华语作家奖”；2014年，白先勇荣获第33届“行政院文化奖”；2015年，白先勇荣获第五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贡献奖）。这些排名和奖项，足以说明白先勇的文学成就和他的文学影响力，是杰出的，跨区域的，至于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玉卿嫂》）和电视剧（《孽子》）获得大奖，以及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荷兰、捷克、韩、希伯来、南斯拉夫等各种语言，则更是体现了他的文学影响力，是跨媒质的和世界性的。

从2003年开始，白先勇制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后来又制作新版《玉簪记》，并在海峡两岸的著名高校设立“昆曲传承计划”，这一“文化实践”使白先勇不但打通古今，“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白先勇语），而且走出文字世界，迈向综合艺术——就作家的“跨界”文化实践而言，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巨大影响力的，大概无出其右者。

无论是在地域跨度，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白先勇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使得对白先勇的研究不但是“世界华文文学”的，而且是“跨界”的。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一开始，就遇到这样一个丰富而又杰出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

研究白先勇，势必要将研究视域从台湾延伸到与白先勇有关的香港、北美（最后回到大陆）；研究白先勇，也必然会将研究视域扩大到与白先勇有关的台湾作家（且不说白先勇的交游，光是想想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就知道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而且这些“台湾”作家，包括了来台湾的东南亚作家和后来从台湾远赴欧洲、北美的作家）。明了了这样的一个学术谱系、学术网络和学术轨迹，也就明了了这本书中几个小辑之间的内在“逻辑”——“白先勇与《牡丹亭》”看上去是个“作家研究”小辑，但它却是其他三个“区域研究”小辑的起点和支撑点。

当然，这是就几个小辑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言的，本书中几个小辑之间

的研究内容，并没有这样的关联性。“大陆‘历史’”小辑中的几篇文章，带有一种对大陆文学和学术研究历史回望的意味；“台港‘记忆’”小辑中的文章，讨论的大多与台港作家的心灵记忆有关；“海外‘语系’”小辑，则是就着对“华语语系文学”的认识，将“语系”一词借用在这里，指代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系”。

“历史”“记忆”和“语系”，是我为书中文章归类时想到的“关键词”，写好后发现，其实它们也可以用来作为认识和概括世界华文文学的“关键词”，于是我把书名定为《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

2016年1月8日

目 录

自序 001

大陆“历史”

论中国新文学中讽刺小说的三种类型

——以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为例 003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意义 023

执着·比喻·尊严

——论毕飞宇的《推拿》兼及《青衣》《玉米》等其他小说
..... 031

立足上海，放眼世界

——评朱蕊的《上海之妖》 043

少年成长与学术姿态

——读陈思和的《1966—1970 暗淡岁月》 053

打破三个“中心主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期待结构性调整

——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说开去 061

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概述（二〇〇七年） 069

《台港文学选刊》：一部视角独特的“文学史”和“学术史”

——为《台港文学选刊》创刊三十周年而作 080

港台“记忆”

从“四代人”到“三世人”

- 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和“台湾三部曲” 087

我轻轻地招手，带走每一片云彩

- 论陶然散文兼及《风中下午茶》 104

风雅蕴藉秦岭雪 意趣高古《石桥品汇》 110

怀旧是常情

- 品味《从前》 117

《香港文学》选集系列：从《香港文学》看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视角

- 120

曾敏之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125

文化视野观照下的台湾当代文学

- 评《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 130

海外“语系”

“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发展及批判

- 以史书美、王德威为论述中心 139

新移民文学：跨区域跨文化的华文文学 162

经典化的条件及可能

- 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创作优势分析 166

论北美华人文学中的故国历史和个人记忆 172

从《金山》到《沙捞越战事》

- 张翎、陈河比较论 184

“告别”的姿态和意义

- 论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 196

寻“美”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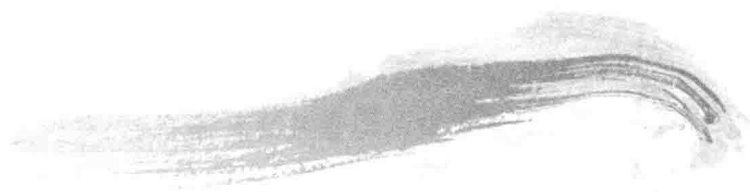
- 论朵拉散文的独特性 207

遗憾有时候是一种悲绝的美丽	
——简论朵拉的微型小说	218
“我从来不放弃”：从一个人看一种精神和一段历史	
——读菲尔的《古楼河上的星光——拿督许廷炎回忆录》	222
与华夏结缘	
——读马悦然的《另一种乡愁》	225

白先勇与《牡丹亭》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	231
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	
——论白先勇的《纽约客》	242
跨越与救赎	
——论白先勇的《Danny Boy》	249
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当代意义	259
昆剧青春版《牡丹亭》苏州制作过程“场记”	268
文武父子古都缘	
——白崇禧与白先勇的南京印记	274

大陆“历史”



论中国新文学中讽刺小说的三种类型

——以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为例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讽刺小说是个相当重要且成就突出的“门类”，在这个领域活跃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作家，有鲁迅、沙汀、老舍、张天翼、沈从文、萧红、废名、钱钟书、张恨水、赵树理、王禛和、黄春明等。鲁迅的《阿Q正传》、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老舍的《猫城记》、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钱钟书的《围城》、王禛和的《嫁妆一牛车》、黄春明的《我爱玛莉》等作品不但是中国新文学中的经典名作，而且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讽刺小说中的杰出代表。这些作品虽然都可以纳入讽刺小说这一“门类”，但它们在作家笔下所表现出的创作个性和体现在作品中的讽刺“特点”，却各不相同。本文选取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三位作家为分析重点，探讨中国新文学中讽刺小说的历史发展和传统变迁，是如何体现在这三位作家身上的，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对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三位作家讽刺小说的分析，来考察中国讽刺小说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不同的特色，并按照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延伸递嬗。

一、三位作家的共性：都具社会批判精神

将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放在一起进行论述，固然是为了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别，但首先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相似的共性：在“同”中寻找出

“异”，才是“异”存在的前提，如果是完全不相干的“异”，那指出这种“异”是没有意义的。对于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这三位作家而言，他们的共性，主要体现为都具有社会批判精神。

鲁迅对社会的批判，重在要“揭出”“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的“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从他最早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他的讽刺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乃至到他的后期小说《孤独者》《伤逝》《离婚》，鲁迅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往往不是就具体的社会现象展开批判，而更多的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文化与精神痼疾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挖掘，《狂人日记》展示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吃人”本性；《阿Q正传》针砭的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在鲁迅每篇小说故事情节“写实”层面的背后，都深隐着一个更高的意蕴指向，那就是要通过“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②。

要通过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首先就要运用文艺，对麻醉、禁锢、愚化国民的封建传统旧文化以及由这种旧文化长期累积而造成的文化心理，进行抨击、揭露和批判，这是鲁迅文学思想的基本逻辑，也是他运用文艺进行“启蒙”的始终如一的立场。这样的逻辑和立场，导致了鲁迅作品中的社会批判，总是聚焦在“现实”表象背后的国人精神文化心理。

在最能代表鲁迅讽刺小说风格的《阿Q正传》里，鲁迅借助对阿Q这一人物身上“精神胜利法”的深刻呈现和艺术表达，在“暴露”了“国民的弱点”^③的同时，更希望“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③ 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①。《阿Q正传》的成功，充分表明鲁迅对国人精神文化心理的挖掘和展示，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注重开掘内在的“国民的灵魂”（精神文化心理），使得鲁迅的社会批判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刻性和独特性，相对而言，张天翼的社会批判，则更多地聚焦于社会矛盾、政治现实和阶级对立这样一些“外在”的社会“现实”层面。张天翼是个左翼作家，其创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小说（以讽刺小说见长）对社会进行批判，既构成了他作品的基本“底色”，也显示了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揭示社会丑恶现象、表现社会矛盾冲突、呈现阶级对立和斗争，是张天翼讽刺小说最为重要的主题。在张天翼的众多讽刺小说中，无论是《报复》《皮带》《二十一个》《小彼得》《出走以后》，还是《脊背与奶子》《砥柱》《包氏父子》《华威先生》，展示给读者的，是社会严重对立、阶级矛盾突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集中表现这些社会现实问题，并加以讽刺和批判，也就成为张天翼社会批判的基本特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和张天翼，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黄春明，不但有着几十年的时间距离，而且还有着分属海峡两岸的空间距离。当黄春明在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开始崛起的时候，他面临的问题，当然和几十年前中国大陆的鲁迅和张天翼有所不同，时空差异性，导致了黄春明在“气质”上更属于台湾六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然而，黄春明与鲁迅、张天翼所面对的时代、社会虽然不同，但在社会批判这一点上，他却与鲁迅和张天翼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说鲁迅的社会批判，聚焦于对国人精神文化心理（内在灵魂）的挖掘和刻画；张天翼的社会批判，偏重于对社会问题和现实政治（外在现实）的展示和书写，那么黄春明的社会批判，则更多地体现为他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人位置处境的清醒认识和基本判断。

黄春明来自宜兰乡下，天然的草根性使他对台湾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

^①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2页。

感情，对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公不义的拒绝和抗议，使他在拿起笔来描写这个社会的时候，笔锋自然饱蘸批判的力量。与鲁迅和张天翼不同的是，黄春明对社会的批判，是与他看取台湾社会的位置与角度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站在乡土（相对于都市）与台湾（相对于美国和日本）来发现台湾社会的种种弊病的，相对于鲁迅的“俯视”（画国人的灵魂）和张天翼的“平视”（写当下的社会），黄春明是以一种“仰视”^①的角度，实现和展开对社会的批判。

黄春明最早的成名作《“城仔”落车》，写一个台湾宜兰的孩子阿松和祖母一起乘车去“城仔”见母亲，在乘车过程中宜兰与城仔的“差别”，导致了阿松和祖母对“城仔”既渴望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在这个过程中，黄春明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性，隐然可见。这种以“低处”为立足点，站在“低处”看出去，发现“高处”的问题并反过来对“高处”进行批判的结构，后来在黄春明的小说中一再出现，成为黄春明小说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结构性存在。无论是《溺死一只老猫》还是《看海的日子》，也不论是《甘庚伯的黄昏》《苹果的滋味》还是《两个油漆匠》，更不用说《莎哟娜啦·再见》和《我爱玛莉》，这些黄春明的代表作，都隐含着这样一种从“低”看“高”并对“高”加以揭露、批判的写作态势。

黄春明是个立足乡土的台湾作家，他对台湾乡土“位置”和“立场”的天然亲近和自然选择，决定了他是从“台湾”“土地”这个“低位”（黄春明喜欢“低位”，他后来的儿童“视角”、儿童“位置”和儿童“立场”，可以说也是一种“低位”）去看取耸立在其上的“美日”“都市”等“高处”并由此形成由“低”看“高”的“仰视”视角，当然，黄春明的“仰视”视角，只是一种看取社会、书写台湾的基本“视力路径”，在“看到”了台湾社会和台湾处境的现状之后，他就从“仰视”的视角一变而为反思、批判的姿态，对“高处”进行深刻的揭示和毫不留情地嘲讽。

^① 这里的“仰视”，并不含“崇敬”“高看”之意，而是一种“技术性”的看取角度和姿态。

黄春明对台湾社会的揭示与批判，与他对台湾人（台湾社会）位置处境的清醒认识、深刻思考和独立判断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讲，后者决定了黄春明对台湾社会批判的基本特质。在早期的《“城仔”落车》中，黄春明向我们展示的是台湾乡村贫民对“进城”的惶恐和焦虑，这种“惶恐”和焦虑不但体现为对城市（“城仔”）的茫然无知，更表现为对“外省人爸爸”的陌生和不可知——这是当年台湾人才会有心理感受；在《溺死一只老猫》中，我们看到的是台湾乡民在“现代物质文明”压迫下的焦虑、痛苦和反抗——而这种焦虑、痛苦和反抗，是台湾社会从相对落后、“低级”的农业/传统社会向较为先进、“高级”的工业/现代社会转型中产生的，这是一种人间悲剧，却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台湾社会发展的悖论，即在其中；在《看海的日子》和《两个油漆匠》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台湾乡土社会单纯、明了、淳朴、温情的特质，并以此战胜人间的不公和邪恶，让人（白梅）得以“重生”，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台湾都市社会复杂、晦暗、狡黠、冷漠的特质滋生了人间的压迫和罪恶，让人（猴子）走向毁灭；在《苹果的滋味》《莎哟娜啦·再见》和《我爱玛莉》《小寡妇》中，我们看到了代表所谓先进/高级的美、日（社会、人）对显得落后/低级的台湾（社会、人）给予的“施舍”、凌辱并造就出后者一种自我/内在奴化的心理。

黄春明在呈现/展示台湾社会的这种“真实”时，当然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单纯“写实”，而是在“写实”的背后，寄托着痛切的批判（对美日、对都市）和真挚的同情（对乡土、对下层民众）。黄春明的这种态度和立场，虽然与出身背景（宜兰乡下）、阶级状况（农人、师范生）、个人性格（强悍而又细腻、刚硬而又温柔）有关，但最根本的，是源自他对台湾社会处境的深刻体验、清醒认识和独立判断。在黄春明看来，台湾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历史趋势，不可阻挡，然而这个过程，却以对台湾乡土社会传统民众的侵犯、凌辱和剥夺为代价，而伴随着这个过程而来的美、日经济“新殖民”的出现，又对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的内在心理，产生巨大冲击和负面影响，这一切，都使黄春明从中看到了台湾社会

的自身状况和国际处境，并由此生发出他社会批判的立足点和着力点：从乡土出发，批判反思都市之“恶”；从台湾出发，批判反思美日“新殖民”。

于是，虽然都聚焦社会批判，但黄春明的社会批判，与鲁迅（注重“精神”“心理”）和张天翼（注重“社会”“现实”）的社会批判比起来，就有了属于他自己的视野（“乡土”）、角度（从“低”向“高”）和立场（“台湾”）。

二、三位作家不同的讽刺特点：冷嘲、热讽、逗谑

“讽刺”（satire）在西方是种文体，有时也是图画和表演艺术，它通过对罪恶、愚笨、弊端和缺陷的嘲笑，力图借助对羞耻感的激发，以达到改进个人、组织、政府和社会的目的。虽然讽刺常常意味着幽默，可是它更大的目的，却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批判，旨在通过机智来引起人们对社会上个别或普遍事务的关注。“讽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强烈的反讽（irony）和嘲弄（sarcasm）特性，“在讽刺中，反讽是攻击性的”。在讽刺书写中，常常会运用戏仿（parody）、谑弄（burlesque）、夸张（exaggeration）、并列（juxtaposition）、比较（comparison）、类比（analogy）和双关（double entendre）等手法。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遭遇的苦难、战争以及社会本身的贫弱、罪恶、腐败和黑暗，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产生讽刺文学的丰富土壤，郑伯奇曾说：“讽刺文学不是下意识的产物，也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在阶级社会中讽刺文学是一种斗争的武器。但是，同样是斗争的武器，讽刺文学，在斗争的发展过程上，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中国现在讽刺文学也一天一天发达起来了。这明显地有它的社会的根据。”^① 二十世纪中国文

^① 郑伯奇：《幽默小论——附论讽刺文学的发生》，《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